

西柏坡时期 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历史经验

姚志军

摘要:西柏坡时期,为应对历史转折时期错综复杂的局势和环境变化,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战争、土改、整党、城市接管、统一战线等中心工作,通过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开展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健全党委制以及开展“两个务必”“赶考”历史警示等重大举措,努力锻造有纪律、有科学理论武装、采取科学民主方法、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在管党治党与推动历史进程相结合、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相结合、从严治党与发扬民主相结合,以及培育革命精神与理想信念教育相结合等方面,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管党治党;请示报告制度;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健全党委制;革命精神

中图分类号:D231;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8)01-0097-08

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史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执着追求、不懈探索的永恒课题。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把中国共产党战胜强敌、夺取革命胜利的原因归结为三件“主要武器”：“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①毛泽东不仅科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历经艰难曲折和浴血奋战而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经验,也通过对“这样的党”的反复着重强调,阐明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深刻命题。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处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和摧枯拉朽的时代变革中。为应对历史转折时期错综复杂的局势和环境变化,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战争、土改、整党、城市接管、统一战线等中心工作,通过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开展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健全党委制以及开展“两

作者简介:姚志军,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石家庄,050024。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柏坡时期人民主体地位建构及当代价值研究”(16JJD770050)阶段性成果。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页。

个务必”“赶考”历史警示等重大举措,努力锻造一个有纪律、有科学理论武装、采取科学民主方法、密切联系群众的“这样的党”,为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管党治党与推动历史进程相结合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把管党治党与推动历史进程相结合,不仅使党空前发展壮大,也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在管党治党中推动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中推动历史发展,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与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相结合,把党的革命实践与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相结合,从而谱写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恢弘史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担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任。西柏坡时期,伴随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迎来历史的转折点——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①在这个历史转折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打游击,转入战略进攻后,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要吃、要穿,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敢不敢引导人民前进,争取全面的胜利?^②这一连串的重大问题,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能不能胜利、敢不敢胜利”的问题,也提出了“能不能”“敢不敢”适时推动历史前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自身使命出发,明确了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时代主题,以对时局和战争形势全面辩证的分析、一系列周密决策和部署,迎接从乡村到城市、从革命到执政、从战争到和平的巨大历史转变。为应对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巨大考验,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理论学习,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修养,明确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进方向。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党内军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通过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开展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健全党委制等一系列管党治党举措,肃清党内存在的不良思想作风根源,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形成统一的政令军令、统一的意志和行动,促进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除了在战场上拼死抵抗,还千方百计在大中城市进行捣乱和破坏。中国共产党通过大批训练干部、学工业学经济学做生意、学习城市知识和管理经验,克服知识恐慌和本领恐慌,最终学会在城市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斗争,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精心选择重大举措推出时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推出管党治党重大举措,就像星星之火可以引燃中国革命的燎原烈火,有力推动了历史发展进程。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中共中央于1947年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44页。

^② 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255页。

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对“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①的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纲领进行研究部署。会议结束不久的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着手在全党建立请示报告制度。随着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贯彻实施,这一重要的管党治党举措成为革命形势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三大战役收官后的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集中讨论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问题,并通过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准确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发出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号召,并提出“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成为震古烁今的时代强音,至今犹如警钟长鸣,对党的建设发展,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发展,都产生巨大警示和推动作用。

重大举措顺应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科学设计和实施管党治党的重大举措,使管党治党成果、党的建设成果迅速转化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1948年3月,中共中央胜利完成转战陕北的任务,东渡黄河转移到华北。5月初,中共中央在阜平城南庄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讨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地区、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以及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三项议题,这是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发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在全党全军开展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斗争。这场斗争着重在思想作风上肃清党内军内严重存在的不良倾向,引导全党实现战略上的集中统一,凝聚起磅礴的革命力量。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在西柏坡举行,明确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②九月会议结束,毛泽东于9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布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以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这项决定以及随后一系列健全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管党治党举措,为贯彻九月会议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适时发起并夺取战略决战伟大胜利,消灭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有生力量提供了强大的政治、组织保障。

二、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相结合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相结合,极大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管党治党实践。

重大举措涵盖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管党治党重大举措同时涵盖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既可以发挥思想建党的方向引领作用、对错误思想的抵制和纠正作用,又可以发挥制度建设对正确原则的落实保障作用,对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的约束、规范作用,使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两结合、两促进。西柏坡时期的制度建设包括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和健全党委制。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起草发布《关于建立报告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4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三—一九四九)》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4~345页。

制度》的指示。此后,相继起草发布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1948年3月25日)、《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1948年6月5日)、《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1948年6月25日),以及九月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1948年9月13日)等一系列党内指示、决定和决议,对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重大意义、报告内容、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报告撰写和报送要求等作出详细规定,形成规范完善的请示报告制度体系。中共中央还多次发出党内指示,三令五申督促各地各军严格贯彻执行。随着请示报告制度逐步得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还起草发出《健全党委制》(1948年9月20日)、《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3月13日),以及九月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1948年9月13日)等党内指示和决议,不断健全、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一时期的思想建设,包括开展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思想理论学习以及“两个务必”“赶考”历史警示。为贯彻城南庄会议“加强纪律性”的战略部署,从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各地各军通过召开专题会议,对照中央系列指示和要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无纪律无政府思想行为,加强对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策略方法的思想理论认知,增进了党的团结统一。九月会议把“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①列入要解决的八项问题之一。毛泽东号召全党“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②,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将此当作一个政治任务加以注意。为配合开展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1948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通知,要求各地各军公开在党报党刊上发表、印制小册子分发给干部阅读,并组织讨论学习。为推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执政,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向全党发出学习的号召,提出“两个务必”著名论断,全会结束时还指定十二本干部必读书籍,要求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极大地推动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以“两个导向”引领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坚持以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引领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可以刚柔相济,同时发挥制度治党的刚性作用和思想建党的柔性作用,促进党的建设的目标达成,破解党建中的矛盾和现实问题。从目标导向来看,《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开宗明义,指出“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③,从当年起实行报告制度。毛泽东《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在阐明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产生的原因后,结合当时的形势发展,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④。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是为加强中央对各地各军指导,避免革命事业在紧要关头遭受巨大损失;而开展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也是为了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克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的目标都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实现党的政令军令统一,以顺利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从问题导向来看,西柏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三—一九四九)》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6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6页。

坡时期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各地在战争、土改、整党、工商业政策、统一战线等关系全局的工作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亟待整顿规范。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军内,也普遍存在重大事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擅自修改或拒不执行中央政策、把自己管理的区域视为独立国等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蔓延,山头主义和军阀主义泛滥,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害。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以及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正是为了破解这些现实矛盾和突出问题。毛泽东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指出,“我们所以规定这项政策性的经常的全面的报告和请示的制度,是因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仍然有一些(不是一切)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难以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而那些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中央局或分局,则避免了或减少了这样的损失”。^①毛泽东在1948年4月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转许世友等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中,详细阐述了不少地方在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工商业及工运政策、打人杀人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教育政策等多个方面明显违反中央路线和政策的现象,还集中概括了“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②等五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恶劣作风,最后强调“所有这些不良现象,中央要求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③。

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同步实施。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的重大举措同步实施,可以使党的建设的不同举措、不同方面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发挥党的建设的聚合叠加效应。中共中央于1948年1月着手建立请示报告制度;5月的城南庄会议把“加强纪律性”上升到战略层面,并发起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此后,中共中央始终将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和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一并严格要求、同步组织实施。1948年7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重申严格执行报告制度:“希望你们严格督促所属厉行报告制度,你们则应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对中央的报告制度”,“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彻底纠正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④1948年8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电,要求各地改进向中央做综合报告的工作。指示说:“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克服自己及自己属下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依照东北局办法,在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的一次至几次会议上加以认真检讨,实行自我批评,规定克服办法,仍有完全必要。不能因为做几次综合报告,就不检讨这个长期在党内首先在各高级领导机关内存在着尚未解决仅在近来才开始认真解决的关系重大的问题。”^⑤1948年9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军委分会、前委电,也进一步强调必须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在党内军内开展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6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0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02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38页。

三、从严治党与发扬民主相结合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把从严治党与发扬民主相结合,继承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开拓了党的建设发展新境界。

“从严”与“民主”相得益彰。把“从严治党”与“发扬民主”统一于党的建设实践,可以充分运用和发挥矛盾统一规律,使党的建设在更高的层面得到提升。西柏坡时期的从严治党,严在制度详细缜密、体系规范,严在执行雷霆万钧、不留死角,严在思想斗争不留情面、追根溯源,严在以上率下,全党动员。请示报告制度体系由3个党内指示、1个党的决定和1个党的决议组成,^①不仅详细阐述重大意义,规定报告具体内容和事项,还明确规定撰写报告责任人、撰写报告态度、篇幅字数、写作详略、报告频次、报送方式等撰写要求和落实制度,成为一个切合党建实际,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的严谨体系。为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从1948年1月到9月,中共中央多次批转典型报告引导示范,对消极对待或拒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地方军队严厉批评严令执行,多次发出党内指示教育督促、结合发起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肃清不良思想作风根源,克服重重阻力在全党施行。为开展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中共中央反复向全党辨明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和诸多危害,科学洞察并阐明历史转折规律和任务要求,加强全党全军政策纪律教育,严肃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加强斗争中的科学方法指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立行立改纠正工作失误,在全党全军营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良好政治生态。1948年4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转许世友等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严肃指出了华东局对昌潍地区之敌宣布宽大政策出现的严重错误,强调指出:“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军领导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②1948年8月14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各军区及各中央局、分局电,对军队中重大事项目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严重现象提出严厉批评,指出:“仍然将自己所指挥的野战兵团或军区机关部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对于中央发动党内反对这种无纪律状态的危险倾向,仍然没有认真的检讨和反省这样一种现象,是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文电警告说:“我们现在向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们提出警告,在战争第三年内,我们将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③两封电报语气之严厉、态度之坚决,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从严治党治军的坚强决心和意志。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建党之始就强调集体领导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是,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这种领导体制并没有有效建立和实行。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着眼于夺取全国胜利,巩固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和开展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成果,继九月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1948年9月13日)后,又先后在党内发布《健全党委制》(1948年9月20日)、《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结论的一个部分)两个党内

① 详见本文第二部分“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相结合”相关内容介绍。

②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三—一九四九)》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36页。

指示,指定十二本干部必须学习的马列主义书籍,指导全党扩大与建立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求各级党组织健全开会制度、健全会议决策制度、健全集体领导制度、讲究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坚决维护并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从而实现了严明党的制度规矩与民主建设的有机统一。

“从严”与“民主”紧密衔接。结合党的建设发展新的阶段、新的特点,适时设计实施体现“从严”或“民主”不同性质的重大举措,可以形成管党治党的完整链条和党的建设的完整体系。解放战争转入进攻不久,中国共产党对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作出研究部署,并着手建立请示报告制度,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随着请示报告制度推行,各地各军在执行中央方针政策方面、在落实请示报告制度方面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存在着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所以中共中央随即将“加强纪律性”纳入发展战略,开展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这些重大战略举措是“从严”管党治党的举措。九月会议建立请示报告制度与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在中共中央层面形成决议,达成共识,标志着请示报告制度建立,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就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向国民党发起战略决战的前夕,中共中央进一步推出健全党委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党内指示。这些都是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重大举措。

彰显“从严”与“民主”精神。体现“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包括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也内在地彰显着“发扬民主”的精神。《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指出:“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①义务是主观能动的表达,权利是法律职责所赋。这个党内指示,从义务与权力的角度,体现出“从严”与“民主”的关系。1948年8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以及1948年8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电,均充分肯定了东北局召开民主生活会,“认真检讨,实行自我批评,规定克服办法”,以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肃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不良现象的正确做法,并向各地各军推广这种做法。电文最后还指出“你们对于中央的领导工作,不论是内容和方法,如有批评,亦请提出”^②。同时,围绕健全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展开的健全党委制等重大举措,虽然讲的是党委会如何完善党的委员会会议制度,如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如何讲究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等“发扬民主”的重大问题,但放到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全国执政,需要建立健全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机制的更高、更深、更长远的层面上来看,无疑也包含“从严治党”的精神。

四、培育革命精神与理想信念教育相结合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培育革命精神与理想信念教育相结合,不仅给党和人民留下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培育革命精神筑牢精神支柱。把培育革命精神与坚定理想信念相结合,不仅可以凝聚起磅礴的革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五九)》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9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五九)》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38页。

命力量,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也可以使党更加珍视革命胜利成果,始终心怀忧患,继续前进。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革命实践中,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培育和形成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精神,集中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面对敌强我弱的险恶态势所具有的敢打必胜的顽强意志、卓越智慧和巨大勇气。其中,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精神,彰显的是相信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党的纪律、发扬党内民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精神,包含着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思想精髓,包含着善于学经济、学技术、学管理、学习国内外一切先进经验,在学习中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包含着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关系,推动事物科学发展的行为准则;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精神,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①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从乡村迈向城市的分水岭。在历史新的起点上,中共中央认真审视党内存在的“四种情绪”,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不要在“糖弹面前打败仗”。毛泽东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号召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②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出发前提出赶考命题,告诫全党决不当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警惕“四种情绪”、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保持“两个务必”和弘扬“赶考精神”,这些历史警示实质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共中央面向全党进行的理想信念教育。

丰富革命精神谱系传承红色基因。把培育革命精神与坚定理想信念相结合,可以丰富党的革命精神谱系,传承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使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使党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在二十八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一系列伟大革命实践,培育形成了先驱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积淀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打赢三大战役、规划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些伟大革命实践孕育积淀了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精神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既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也具有改天换地、继往开来的鲜明时代特征。

责任编辑:毛殊凡

① 李斌:《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西柏坡侧记》,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13/c_116524927.htm,访问日期:2017年10月13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1439页。

for which the current focus of controversy is how to interpret Article 45, paragraph 1 of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ECT). This issu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at Hague. The controversial parties, PCA and Hague District Court have differences in choosing the “piecemeal approach” or the “all-or-nothing approach”, though they all interpreted Article 45 along with the traditional VCLT interpretation methods. The ambiguity of the treaty contents, the lack of the upper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methods contributed to the dilemma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all together. To solve the dilemma, a secondary means is to set treaty terms more precisely. But it’s much more critical to apply interpretation methods more flexible thus enhancing persuasion. In the long run, it’s also an important goal to reform the interpretation system.

Keywords: Yukos; Jurisdiction; VCLT; Treaty Interpretation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of “Considerable Loss” in the Offence of Infringing Trade Secrets

Qian Yuwen, Shen Jiadan

Abstract: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identified patterns about considerable loss in the offence of infringing trade secrets. Among these patterns, “profit of the infringer” is most common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but it is easy to confuse the relevant standards of civil law and criminal law. Although “loss of the right holder” is the most di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Article 219, but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rights have many, so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is pattern is poor.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intangible assets, “trade secret value” can be estimated when the infringement of its value to the total loss is reasonable. So we should absorb the first three models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model, try to re-give the specific and available content to the “comprehensive determination”. Then reconstruct the infringement of trade secrets by making the standard of the degree of loss of the right person.

Keywords: trade secrets; considerable loss; identified pattern; reconstruction

Study on the Basic Theory of Discipline of the CPC’s History

Wang Binglin

Abstract: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 CPC’s history has clear research objects,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and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in consulting and cultivating.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PC’s history in the new era also encounters new challenges. For example, the discipline positioning is not clear enough, and historical nihilism damages the subject image.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research level of the CPC’s history to further study the subject orientation, guiding theory and method,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 support, academic standardiz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Keywords: the CPC’s history; discipline building; historic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the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in Xibaipo Period

Yao Zhijun

Abstract: During the Xibaipo period, the CPC made every effort to forge a party with disciplined and scientific theories,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methods, and close contact with the masses, through establishing a system of reporting impeachments, carrying out the anti-discipline and anarchy struggle, perfecting the Party committee system and carrying out historical warnings on “two musts” and “censoring”. All above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in ensuring full and strict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Keywords: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report system; struggle with anti-discipline and anarchy; improve the Party committee system; revolutionary spirit